

## 对文化问题的新探索

### ——“中国走向近代的文化历程”学术讨论会述要

文化问题研究是近年来中国思想界最关注的课题之一。怎样把这场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的讨论引向深入?这已成为当前思想界的有识之士议论最多的问题。1987年9月15日至18日,武汉大学、华中师范大学、湖北大学和湖北省社联在武汉共同主办了“中国走向近代的文化历程”学术讨论会,七十多位国内外学者济济一堂,从探讨中国走向近代的文化历程入手,用现代意识重新审视民族文化传统,以冷静分析的头脑和改革开放的心态对深化文化问题研究进行了富有创见性和启发性的新探索。

在这次学术讨论会上,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化问题仍是讨论的焦点。但是,与会学者并没有把这一讨论停留在罗列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质、比较中西文化的异同优劣的现象性研究上,而是力求站在新的理论高度,对明清之际以来中国走向近代的文化历程进行比较深入的理论思考,提出了一些具有方法论意义的新论点。

首先,提出了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结合点问题。有的学者指出,自明清之际以来,在中国走出中世纪、迈向近代化的文化历程中,由于中西文化汇聚、冲突而产生了“西学中源”说与“中体西用”论两大意识流。这两种思潮的激荡,隐示着这一重大历史课题:近代西学能否和怎样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并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找到它的生根之处,从而通过对西学精华的吸收消化而实现中国文化的自我更新,即依靠自身固有的活力,吐故纳新,继往开来,向现代化飞跃。从明朝万历到“五四”运动,历史走过了坎坷曲折的道路,人们始终围绕着这一历史课题进行思考、争论和探索,但长期未能得到圆满解决。其历史教训在于:中国近代的深重民族苦难所唤起的一代代思想家,面对中西新旧文化之争,虽曾以一种朦胧的历史自觉,把明清之际崛起的早期启蒙学者看作自己的先驱,希图继其未竟之业;但是,迫于救亡图存的政治形势,忙于日新月异的西学引进,他们并未注意清理早期启蒙思想的遗产,并未认真探寻中国思想启蒙的特殊道路。因此,他们总是陷于中西对立、体用两概的思维模式之中,没有找到近代西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结合点。在当前文化研究的热潮中,我们应当以清醒的历史自觉,反复咀嚼历史的教训,重新解决这一历史课题。

其次,提出了传统文化与文化传统的区分问题。有的学者认为,传统可以区分为传统文化和文化传统这样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差别的不同方面。传统文化是外在于主体的、历史地凝固了的种种文化成果,是一些死的“物”,而文化传统则是内在于主体之中,支配着民族认知和行为的习惯势力。对于传统文化,人们可以阐释它、批评它,给出种种自己的见解;可以表彰它、否定它,为了现实的种种需要。而对于文化传统,人们往往无力超越,而只得通过它去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并在认识与改造中推动文化传统的变化。一切现代化都是某种文化传统在现代条件下的存在,是创新了、发展了的传统。同样,一切文化传统只有以现代化为目标,并着实向现代化转化,才能确保自己作为活的传统而存在。但长期以来,人们并未看到传统文化与文化传统的区分,将传统看成是外在于人的、可以任意去取的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处于互不相容的对立之中。这样就不可能找到实现中国文化传统现代化的道路。

再次,提出了中国文化传统向现代化转化的复杂性问题。有的学者指出,二十世纪世界日益走向现代化,中西文化交流存在着明显的“双向对逆”运动,即双方都有一部分人在背弃自己的传统,双方又都有一部分人向被各自背弃的以及对方的传统靠拢,从而形成批判与回归并存的复杂局面,既同时打破了各自传统文化

体系的自足与封闭,又同时产生出对自己传统文化和价值观念的危机感和优越感,但其主流则是以更新的现代文化观念检讨、评估、解释本民族文化传统,吸取外来文化的某些成份,而以本民族文化精神为中心,重构具有世界现代观念和本民族文化传统、文化精神双重品格的现代新文化。中国近代以来文化传统主义发展经历了三种形式——原初形式(顽固派)、近代形式(国粹派)、现代形式(新儒家),就反映了这种文化运动的复杂性。

2 这次学术讨论会的一个特点,是一些学者开始把文化问题研究的重心由文化史研究转向对文化理论的探讨。他们明确地提出了建立马克思主义文化学、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等重大理论课题,并作了一些初步的探讨。

主张建立文化学的学者认为:文化的本质就是“人化”,即主体客体化与客体主体化、外化与内化的动态统一。文化学是研究“人化”的过程,即人类为实现自身价值、满足自身需要而进行的创造性活动过程、以及它的价值和规律的一门科学,是与哲学、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等相互交叉、渗透而又相对独立的边缘学科。它要研究的,正是人类为实现自身的本质、满足自身的需要而创造出来的生活方式的过程和物质与精神成果。文化学通过对于文化殊相的研究刻意认识其背后的共相、通过对文化部分的把握达到对文化总体的把握,由“器”而“道”,进行概括和抽象,上升到理性和哲学的高度,认识文化的要素、特征、性质、动力、结构、功能、价值、生命,研究文化系统的类型、机制、历程和文化系统之间的传播、接触、碰撞、选择、交融、整合的规律。文化学研究的内容大体上包括三个层次:(一)理论文化学;(二)文化史学、比较文化学;(三)文化管理学、应用文化学。理论文化学的核心是哲学人类学或文化哲学。

主张建立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的学者认为,文化可以分为文化现象与文化结构两个基本层次。文化现象指不同民族、不同时代的人所创造的各种文化形式,这是各门具体科学和科学史研究的对象。文化结构则比文化现象更凝重、更深刻、更本质,又可分为具体文化结构与抽象文化结构。具体文化结构是人类历史的某一时代、某一民族的语言、习俗、社会制度、心理和生理状况的总和,这是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抽象文化结构则是对具体文化结构进行抽象所得出的最一般的智力结构、物质文化结构和行为模式,这才是文化哲学的研究对象。因此,文化哲学实际上是以文化为本体,探究人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是一种比理性主义、非理性主义更深刻的哲学人学。在文化哲学看来,人类正是通过自己的活动、劳作创造了文化的宇宙,把自己同自然界联系、沟通起来。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与以往文化哲学的不同,首先在于用马克思的“实践”概念改造以往文化哲学的“活动”概念,把人的主体性建立在实践的基础上。这一改造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把活动同实践相联系,强调人的活动的本质不是先验的,而是实践的;二是把实践同文化相联系,强调只有通过人类文化才能真正认识和理解人类实践。

这些新观点引起了与会学者的很大兴趣,大家对此讨论热烈,就有没有必要建立文化学、文化哲学,有没有可能建立马克思主义文化学和文化哲学,文化学与文化哲学的关系等问题提出了各种论点。

3 这次学术讨论会的又一个特点,是一些学者把对文化的研究由宏观层次转向微观层次。这一文化研究新动向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重视对明清之际以来科学思想、小说理论、民情风俗、社区心态的具体研究。例如,一些学者分别探析了方以智、朱载堉的自然科学思想,论证了明代后期自然科学的发展已产生了近代科学的萌芽。又如,一些学者分别探讨了方以智、严复、张謇、冯友兰的中西文化观,揭示了不同时代的先进知识分子对中国走向近代问题的思考与探索。再如,一些学者考察了晚清的西俗观、上海人心态发展等问题,注意到中国近代化过程中的社会心理的变化。与会学者认为,这些研究从不同层面拓展了、深化了对中国走向近代的文化历程的认识,揭示了这一历程的特殊性和曲折性。

第二,重视吸取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的研究成果。讨论会上,一些学者着重介绍了当代中国学者对彝族文化、瑶族文化的研究成果,引起了与会学者的广泛兴趣。大家认为,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中国文化不仅指汉族文化,而且包括了各少数民族文化。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应当注意研究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吸取当代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资料。这条由片面到全面、由书斋到田野、由抽象到具体、由理论到实践的研究文化问题之路,将从一个方面把文化问题研究引向深入,是一条充满生机和希望的路。

(李维武)